

口述史和中国当代军事史研究

——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

●徐有威

摘 要:口述史为中国近现代史军事史研究贡献良多。在 1960 年代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的大背景下,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操作下,各地的小三线建设纷纷上马。上海小三线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它是上海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于安徽南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当代军事史的角度看,上海小三线建设无疑是中国当代军事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处于处女地状态的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口述史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关键词:口述史;中国当代军事史;上海小三线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2)01-0149-03

作 者: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口述史的研究,近 30 多年来在学术界可谓风生水起。在西方现代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型历史研究方法被陆续传入中国,并逐步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步尝试以西方口述史学方法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可以说,口述史已经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

关于口述史的定义,国内学术界有不少的说法,以程中原先生的界定比较全面,即口述史就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目前口述史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四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口述史、访谈录、回忆录(其中包含别人记录整理的)、人物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各种口述史料。而笔者以为,这些形式中,应该以口述史和访谈录最为核心。而如果口述史能够有机会为军事史服务,以现有的条件和环境看,则以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为重,而尤以中国当代军事史为重中之重(为论述方便,笔者将 1949 年的中国军事史以后称之为中国当代军事史)。道理显而易见,中国当代军事史的史料来源很是有限,出于各种原因,档案资料按照有关的规定要 30 年之后才可以解密。即在 2011 年的今天,如果一路绿灯万事顺利,我们看到的解密的档案只是 1981 年之前的,事实上即使解密也是局部的。同时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不过 60 多年,军事史资料的整理和学术性的研究较少。当代中国史研究者只能在有限的文献资料内进行研究,而口述史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助以一臂之力。

事实上,口述史也已经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研究贡献多时了。其最早可追溯到“文革”前出版的《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以及截止 1966 年 5 月全国征集到的约一亿字文史资料中的军事方面的文章。这些著述为军事史研究提供的养料是无法估计的,2009 年 20 卷的《星火燎原全集》出版引起轰动,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近年来和近现代军事史关系比较密切的口述史著述,首推张成德、孙

*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和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之“上海小三线建设”口述史料项目之资助。谨致谢意。

丽萍主编的《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②。

2008 年 5 月在香港出版的《张发奎上将回忆录》中译本也是另外一种令人瞩目的近现代史军事史方面的口述史。据负责该书校订、注释的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介绍,《张发奎上将回忆录》是美国人花巨资请一位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 400 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多人,又以有关军政人员的大量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 1000 多页的英文稿本。该书的译注工作则长达六个春秋才完成,全书 55 万字,单注释就达 533 条、15 万字^③。

在中国当代军事史范围内,除去不多见的口述史文章散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外,由志愿军司令部和 1950 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军事参谋王亚志回忆,沈志华和李丹慧整理的《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以及志愿军老战士何宗光的《那年,那月,鸭绿江那边的记忆》(长征出版社 2011 年版)最有影响。前者除去因为作者身份特殊而引人注目外,其口述史的成书的方式即“批判口述史学”值得口述史实践者高度的关注^④。后者被誉为“一部朝鲜战争最前线最真实的口述史”而得到读者的强烈推荐。2011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黄继树的《败兵成匪:1949 到 1952 年的剿匪往事》一书,利用了作者采访广西土匪的大量口述史资料,深化了建国初期的剿匪史研究,成为口述史有益于史学研究的又一成功典范^⑤。

二

笔者目前正在从事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课题,愿借此题目对口述史在军事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阐述。

在 1960 年代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上马的大背景下,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操作下,各地的小三线建设纷纷出现。上海小三线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上海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于安徽南部山区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65 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着手建设后方小三线,到 1984 年决定将后方小三线无偿移交给安徽省,1988 年完成移交工作。上海小三线建设历经 24 个年,先后在皖南的徽州、安庆和宣城三个专区和浙江临安等 13 个县(市)境内建成 81 个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上海市对此基地先后共投资 6.4 亿元,拥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 57000 余人,职工家属 16000 余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 1500 人。从当代军事史的角度看,上海小三线建设无疑是中国当代军工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学术界对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的研究多少还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对各地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则可谓寥若晨星,而上海小三线建设更加如此。有关上海小三线的文献资料,除去一本薄薄的 1988 年 4 月小三线建设刚刚结束调整时由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撰写的《上海小三线党史》的小册子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就连那些小三线企业确切完整的名字和地点也不甚清楚。而随着 1988 年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调整,全部小三线企业返回上海,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现在如果要进行口述史采访,则根本无法按照过去的企业序列和系统找到其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时光流逝,一些老同志已经退休乃至去世。翻阅厚厚的《上海市档案馆指南》,因为小三线厂家的名字往往是代号和化名,根本没有贴上诸如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名号,因此即便是小三线企业,你也根本不知道!而通过有关数据库查找小三线资料,如果仅仅靠输入“上海小三线”这个主题词,只有简单的几条而已。

此时此刻,口述史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小三线的上述的特殊性,使得我们一度要找到这些口述史的对象也异常困难。

所谓天助自助,2009 年 11 月,在安徽省委党校的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我见到了一位 1988 年时担任安徽省的上海小三线办公室的副科长,当时他参与了上海小三线移交安徽的过程。出于对文献资料强烈的保存意识,他竟然保留着一本 1988 年印的 91 页厚的《安徽省、上海市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

负责人通讯录》，使得我们至少知道了上海方面参与了小三线调整时期的各级干部的名字。口述史的对象有了最初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加上其他的多方努力和尝试，包括网络寻找和各方面师友的介绍，滚雪球现象出现了！可供采访的人员的名单越来越长，从开始的愁眉苦脸找不到采访者发展到现在的手忙脚乱来不及采访。从至今为止的采访结果看，就小三线建设研究这个具体的课题而言，我们对口述史至少有以下初步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口述史提供了信息源。上海小三线建设不同其他的研究课题有以往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有线索可查，除去上述提及的《上海小三线党史》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我们特别重视遇到的每一位的亲历者，无论是部局级的领导还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乃至安徽当地的征地工。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故事，他们提供的他们自己保存多年的资料，都成为我们的信息源。成为我们采访下一个口述史对象时进一步询问核实的问题，成为我们去查找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的信息源。例如他们提供的小三线的各企业的厂名信息，就使得我们在寻找报刊和档案资料过程中，仿佛得到了一把打开进入小三线资料宝库大门的金钥匙。

其次，与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帮助和提示我们对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公文化的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同时还可以补充了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不可能和不方便记录的场景，令人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例如，小三线人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按照这个故事线索，我们首先发现了小三线领导高层会议的讨论决策的档案资料，再看到厂报和团讯等企业报刊中的内部新闻报道，最后还查找到了上海有关报刊中的公开报道。随后我们再把这些资料反馈给当事人（其中的一些人就是当年这些档案资料和新闻报道的撰稿人），或其他可能知道情况的其他当事人阅读，请他们在事发30多年后再次补充当时的场景，也许还有背后的不可为人道的往事。这个多次往返的过程无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链，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之复杂令人难以想象。而在口述史的采访过程中，细细询问之下，往往会有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感觉，这对解读公开的文件会有莫大的帮助。这也是我在采访小三线时的一个重要的感觉。

最后，必须加速口述史采访的进度。我们采访的小三线的老同志，1965年第一批进入皖南小三线的开拓者大部分已经去世，或因为年迈体弱失去了表达能力。去年夏天，我们曾经在华东医院的干部病房的楼上楼下来回奔跑，因为一些年长的参与小三线建设的上海老干部都在此进行治疗或疗养。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参加小三线工作的同志虽稍微年轻，但是英年早逝的也不在少数。在采访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叹息：“你们如果早几年来，就好了！”抢救口述史史料，是我们每位有志者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有关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口述史和当代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的关系，请参见以下论著：杨祥银：《中国口述史学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陈伟刚：《口述史学的特征与中共党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宋学勤：《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李桂华：《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②罗朝晖：《集体记忆与历史重构——评〈山西抗战口述史〉》，《历史教学》2006年第12期；陈旭清：《简论口述史的操作——以山西抗战口述史为例》，《晋阳学刊》2005年第3期；叶昌纲：《评〈山西抗战口述史〉》，《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③沈飞德：《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前景和问题》，《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④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3页。

⑤徐有威：《听听土匪们怎么说》，《东方早报》2011年8月7日。

（责任编辑 朱加荣）